

科技编辑的学术滋养

李建新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200072,上海

科技编辑是一个可以给人提供学术滋养的职业。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于科技编辑。选择和从事科技编辑的工作,给了我诸多的学术滋养,包括滋养了我后来的一切学术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我人生和学术的导师。

1 循规蹈矩与标准化

工科毕业的我能够在大学毕业后留校到学校的党委宣传部工作,完全拜我的“笔头”所致。大学期间我在媒体发表了几篇文章,这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入学的大学来讲,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加上在学校的校报等媒体上也发过几个“豆腐块”,想不到我的作品成为了就业的推荐人。毕业前夕,校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留校工作,“为学校的宣传工作做些贡献”。由此,我把机械工程中的许多知识还给了母校,以“耍笔杆”的方式开始回报这个培养了我4年的学校。

我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校报编辑兼记者,需要有党务、宣传、时政、新闻、编辑、群众工作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干中学”“学中干”加上“临时抱佛脚”的请教与充电,倒也使我的“角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到位”了。我的系统而完整的新闻学、编辑学的知识,就是在那个时期靠自学、请教和“补课”完成的。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喜欢干的“新闻工作”在不久之后就被以“委以重任”的方式而“搬了砖”,我奉调到了太原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开始了科技编辑的工作,这时,离我毕业留校也就过了3年多的时间。来之必须安之、好之、入之。比较以后我发现:科技编辑需要的是理性思维,新闻报道需要的是感性思维;科技编辑需要抽象思维,新闻报道需要形象思维;科技编辑需要循规蹈矩与标准化,新闻报道需要应需应景与时代化。

纵览科技编辑工作,需要遵守的标准规矩还真不少,《编写必备》《标点符号用法》《容易出错的字、词、标点》《编辑实用语文》《论编辑和编辑学》《编辑工作手册》等书籍是那时占领我办公桌和家里写字台的主宾,它们甚至很强势地挤兑了我的文房四宝和《橘中秘》《梅花谱》等“旧欢”。主要原因是工作需要我从这些书籍里找到科技编辑依赖、依从的规矩,为学报的编

辑出版进行学理和法理的准备。

1988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高校自然科学学报青年编辑的业务培训,会上第一次聆听了陈浩元编审的几个有关科技期刊编辑标准化的专题讲座。他针对科技编辑工作的需要,着眼于很实际问题的处理,选择具体的案例,为我们讲解了科技期刊编排规范,法定计量单位及使用方法,外文字母的大小写、正斜体,图、表的格式与处理等专题,有关科技期刊编校标准化的知识及其核心要旨第一次较系统性地进入了我的视野,并经过浩元编审艺术化的讲解而植入了我的内心,使我对科技编辑的工作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以后,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总是喜欢咨询乐于助人的浩元编审。

陈浩元编审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期刊编校的“规矩”,就是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各出版单位依据这些标准制定的“编排规范”。按“规矩”编辑出版期刊是国家对办刊者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标准化的学术滋养,给了我学术研究严谨、认真、遵守学术与出版规矩的视野,我不仅以此为据认真帮助作者的文章“标准化”,同时也养成了撰写学术论文著时务求规范的态度。这个标准化意识的养成,给了我“占得先机”的优势,我写的文章或专著,责任编辑说“规规矩矩”“符合规范”,在文字、体例、文献引用与著录等方面很“标准”,无形中为我赢得了更多发表的机会。

写新闻报道,很少引用参考文献,平时也不太注意对他人成果的尊重。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尤其学习了浩元编审主编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后,方才认识著录参考文献的重要:它是科研工作者著书立说所调研、引用的相关信息资料,是科技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文献著录引文页码是便于读者快捷、准确地查找到所引用的信息,更好地达到信息资源共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注重参考文献及其著录格式的规范化,再到学术过程的每一个细节的细究、详考,培养了我学术期刊出版标准化的思维,指明了学术研究的绿色通道,这是兼具学术内外的一种综合补给。

2 探赜索隐与方法论

科技编辑与科技工作的共同点是永远在为探求与解释“未知”而努力,也很讲究方法论的得当与否。我

之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既种别人的地,也耕自己的田”。我们编辑的学报曾获得全国评奖的二等奖,我自己的论文《试论编辑的记者观》获得了首届全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编辑学论著一等奖(1991年),本人还获得过第一届“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奖”(1993年)等一些奖项,这都归功于科技编辑工作中养成的对“未知”的探求和从工作与研究的实际需要而摸索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不宁唯是,科技编辑还为我拓展出了一条在学术道路上继续提高的通道。1996年,我入华中科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选择的方向是科技哲学,当时全国各地特别是高校学报青年编辑选这个方向的人比较多。科技编辑界的专家钱文霖编审是这个专业的导师和学科带头人,他后来成为了我的导师。这个业余时间喜欢下棋,尤善下围棋的前辈以《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扬》《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而为学界和社会认可的专家,在国内首创科技编辑的方法论研究,该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他认为,“科技编辑是专业技术人员”,“一定得从文稿中挑出点毛病来,为作者尽心尽力”,科技编辑除了稿件收发、文字加工、出版的技术处理之外,“要管文稿内容是天经地义的事,管不了也得想办法管”。他的这种敢于在科技编辑领域探赜索隐的态度和方法,明显地为科技编辑成为“专家”寻找到了一条道路。在方法论的层面,科技编辑方法论探讨了“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数学方法”“范畴方法”“逻辑方法”等方法,并就一些科技编辑的学术问题,如“科技编辑的学术作用”“科技论文的特点与写作技巧”“从形式到内容——科技编辑方法的特点之一”“科技编辑常用的一对范畴——相等与不等”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在求学钱先生3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围绕以上课题,众人划桨共同探讨科技编辑的方法论。我的硕士论文《试论科学编辑要有新闻意识》就是在这一学术环境中完成的。论文的写作经过了钱先生9次审读与指导,并在他主持的专门为科技编辑的研究生们开设的“学术沙龙”中经过了师兄们的讨论与“挑毛病”,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也曾利用在北京“北漂”的机会请教陈浩元等学界名家,从诸多大家身上汲取养分。最后,论文不仅顺利通过,还得到了一个年级优秀论文的奖励。后来,浩元编辑有感于这篇文章可能会对科技期刊编辑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嘱咐我修改后以《科技期刊编辑要有新闻意识》为题,在《编辑学报》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一名刊发表文章。

“瑜伽新绿去旧尘,编辑自求起涛声;导扬一卷旗帜艳,登堂入室正其程。”这是我研修完《科技编辑方

法论研究导扬》后给钱文霖老师的题赠。现在回过头来看,能够冲破“编辑无学”“杂学不是学”的藩篱,在科技编辑的工作中寻找到带有方法性、规律性、指导性的“学理”,就像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路,循此,我认为这样的法则可以效法复制到其他学科,这是我读科技哲学编辑研究生所获得的最大的学术滋养。这个“所得”也成为了我从此以后的学术研究的方法论。

注重方法的探寻与应用,有探赜索隐的精神,从看似不能入手的地方发现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并在持之以恒的坚持中取得突破,的确与我浸润科技编辑的干系最直接。

3 领导标新与个性化

陈浩元编审喜欢“侃大山”,也很会“侃”,对于科技编辑的许多领悟、认知、学术滋养,几乎都是我在和他“侃”中获得的。

他说他很喜欢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导标新二月花”的诗句,而科技编辑就是再创造,再创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彰显研究者个性化的成果、以“领导标新”的方式呈现的过程。陈老师主编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学报》能够赢得很高的声誉,成为中国期刊方阵中的翘楚,与他独具匠心的策划,刊物精准的定位、独特的风格等密不可分,是刊物“领导标新”的特色所致。

“莫说书生寂寞呆,学子世界亦精彩;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科技编辑“精彩”之处,其实就是他的“领导标新”。当年我们编辑的学报和我自己的学术论文曾获得全国高校学报评比的奖项。浩元编审在评奖之后告诉我说:你们的学报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在全国排百名左右的高校办的学报,能够获奖并位居第38名,评委会看重的是“选题重点突出、刊物特点比较鲜明”;你的文章能够获奖,是“还没见到有人对科学编辑要有新闻意识这个课题进行过研究,文章的观点和论述也很有特点,给人以新颖独特的感觉”。

从事科技编辑的以上2个事例具有比任何教科书都有的说服力:无论刊物还是作品,一定要有“个性化”的内在特点,刊物要有区别于同类期刊的编辑管理与经营之道,包括编辑部与编辑人员工作法则,编辑规划与选题,组稿与作者工作,文稿的审读与加工,封面、版式与内文设计,营销宣传与管理等;作为论文,也包括编辑自己创作的作品,一定要有新意,绝不能炒旧饭,更不能抄袭、剽窃。学者最大的悲哀就是沦为山寨学子、伪学子。

这2个事例给我的学术滋养是:做学问是一种要

求,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智慧与实力的体现。学者应该崇尚原创至上的原则,把创新的过程看作是提高的过程。也许我们怎样努力都不能成为大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像大师一样思考、一样去创造。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学术标签”,隐去作者的署名而能够让人知道文章是谁写的,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标志。

离开科技编辑的工作岗位后,学业、事业、职业等几方面都要求我有更多的作品呈现。除了埋头耕耘、以勤补拙外,我借助从事科技编辑时建构起来的“领异标新与个性化”的思维法则,一直坚持写能够有别于他人论著的文章,并且把这样的诉求体现在了我对每一篇文章的构思、每一句话的斟酌、每一个词的权衡上来,经年以降,终究有所斩获。我很感谢也很享受自己从事科技期刊编辑时所获得的那种帮助我在日后的研究与写作中知道该如何体现“个性化”的学术滋养。

4 广结善缘与团队论

1987年创立的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是由陈浩元、宋权、朱诚等一批前辈为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人搭建起来的一个交流、合作的大家庭。“为做嫁衣春夏秋,红笔描白少年头;科技园地耕耘细,不为名利为追求”。尽管像陈老师这样的科技编辑一直在为别人忙碌、奉献,但也没有忘记过他们的责任与担当。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的创建与相关活动的开展,就是责任与担当的很好体现。

我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几年时间里,也恰逢研究会的初创时期,我积极地融入这个大家庭并得以认识了陈浩元、钱文霖、万锦堃、李兴昌等学界名家,获得了他们的诸多教益,正是在这个大集体里,实实在在感知到了大家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一种力量,这应该也是一种学术滋养。

研究会广泛开展宣传并贯彻有关科技出版的政策、法规和国家标准,开展科技编辑学、科技期刊学的研究和讨论,组织年会、专题研讨会等学术交流,开展继续教育、培训编辑人员,组织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优秀编辑工作者和优秀编辑学论著评比与表彰,开展与海外期刊的交流等工作,极大地方便了同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1988年,研究会青年委员会成立,我作为山西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会间结识了许多高校青年编辑同人,如当时的青委会负责人汪季贤、郑进保、姚远、姜富明等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把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界的青年人团结了起来,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广结善缘,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巨大的支持。

我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时的另外一个团队,是我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书时的科技哲学研究生培养的团队及其围绕科技编辑研究而创设的“学术沙龙”。在这个团队中,我先后结识了20多位“善缘”,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进行了学术交流与合作,有的人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真正地体现出了团队的合作、协同作用。

“团队是一种认同”,是团队成员基于共同目标和愿景的一种集结。团队的形成不是靠行政或组织的安排,不是靠亲情、关系的链接,不是靠彼此的好感和趣味相投,更不是靠为了获取某些的经济利益。团队特别是学术团队是为了达到或登上某一个学术高峰,为了实现一个学术目标,在一个共同旗帜下的精英聚会,“团队是一种行动”。我深切地体会到,学术团队的行动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团队成员以团队的愿景为目标,不断地进行有指向的学习研究,苦练内功;

2) 团队及其成员应该能够及时地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借助各种交流平台彰显团队的实力,展示外功;

3) 团队及其成员应该能够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与往来,及时获取学界的最新信息以及学术研究的发展态势,提前行动,未雨绸缪,始终行走在学科的前沿阵地;

4) 团队及其成员应该有一种合作和互补的意识,相互支持、互相配合、联合作战、集体冲锋,这是打赢局部甚至整个战役的关键;

5) 团队及其成员在行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竞争中提炼、打造本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并在竞争中强化和提升这个核心竞争力;

6) 团队及其成员应该注意本团队的团队理念、团队精神、团队风格的养成,以此统一大家的认识和行动并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传承,为团队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之一是广结善缘,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的力量。如今,虽然我已经离开了科技编辑这个团队,但内心的感觉是我始终没有离开,感觉我还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因为,正是在这个团队中,我真正感知并收获了团队所给予我的一切,而且,我会以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为指引,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吹响“集结号”,向新的目标发起持续的冲锋。

(2014-05-28 收稿;2014-06-11 修回)